

《管子》今本 76篇，是由西汉的刘向编订。一般认为，该书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地管仲学派代代累积的文章汇总，既有对管仲思想的记录与发挥，也有这些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运用。《管子》一书内容丰富，涉及领域广泛，所蕴含的粮食安全思想不仅为当时齐国富国强兵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指导，而且对于今天在全球化背景下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具有借鉴启示意义。

粟者,王之本事也

中国的粮食安全思想最早可以上溯至春秋战国时期，源于重农思想。《管子》一书包含丰富的重农思想，从各个方面强调农业的重要作用。《管子·治国》更是直接把农业提升到国家兴衰存亡的战略高度加以强调，明确提出“粟者，王之本事也”，详尽剖析农业为国家根本的道理，指出如果一个国家不注重发展农业就会面临灭亡的危险。《管子·五辅》则从治理国家的角度提出农业是国君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是人民富裕的基础，即“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管子·治国》还通过分析农业生产、粮食安全、国富兵强之间的关系——“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指出农业是百姓衣食之源、富民强兵之本，把农业提升至富民、安邦、强兵之基的战略高度加以强调。

在重农思想的基础上，《管子》还特别强调粮食安全的战略意义。《管子·治国》通过考察国家兴衰的历史发现，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不生产粮食的国家是一定会灭亡的，只有尽力从事粮食生产并将粮食保存下来的国家才能够“王”天下，即“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接着，《管子·治国》还分析了为什么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从安定百姓、积累财富、开



□ 赵纪萍

《管子》中的粮食安全理念

疆拓土、成就霸业等方面分析粮食安全之于国家安全的关键作用，即“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此外，《管子》还强调粮食安全的政治意义，指出粮食生产是提高人们文明程度的物质基础，即“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提出“常平仓”构想

粮食安全治理思想，即如何实现粮食安全，是粮食安全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根本落脚点。在前人粮食安全治理思想的基础上，《管子》一书进一步从政治、经济、技术、制度等方面探讨如何保障粮食安全，扩展丰富了粮食安全治理思想。

储积粮食等重要资源保障粮食安全。一方面，《管子》非常重视粮食储备，指出国家粮库储备不足会导致国库财用不足，甚至危及国家存亡，即“仓廩空虚，财用不足，则国毋以固守”，强调加强粮食储备以夯实粮食安全的基础。《管子·事语》《管子·国蓄》等篇都强调统治者应有十年的粮



食储备才能养活百姓、富国强兵。另一方面，《管子》对储备粮荒思想进行了创新与拓展，主张建立粮食分级储备制度来保障粮食安全，提出“常平仓”的构想。所谓“常平仓”，即政府在丰收之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粮价过低伤害农民利益，在歉收之年卖出所储粮食以平抑市场粮价。可以说，“常平仓”构想是对储备粮荒思想的创新和发展，对后世影响深远。从汉代设置“常平仓”开始，历朝历代的“常平仓”在确保粮食安全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增加粮食生产劳动力确保粮食安



全。《管子·小匡》明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统治者就认识到增加农业劳动力之于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采取四民分业制度以稳定农业阶层、增加农业劳动力。春秋时期，社会动荡、战争频繁导致井田制下耕作的奴隶和农奴们大批逃亡，利大易行的工商业也吸引了一大批农民弃农经商，造成农民的大量流失，对粮食安全造成严重冲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管仲辅佐齐桓公改革内政，推行四民分业制度，从国家制度层面稳定农业阶层，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此外，据《管子·乘马》记载，以齐桓公、管仲为

代表的齐国统治者还对井田制及劳役地租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实行“均地分力”“与之分货”等政策，提高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以确保粮食安全。

以基础设施、生产工具以及技术的改进等确保粮食安全。一是改进生产工具提高粮食产量。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工具得到改进。据《管子·乘马》《管子·海王》记载，犁耕技术得到应用，而且已经开始使用铁犁。铁制生产工具的出现，推动了战国时期包括齐在内的各诸侯国耕作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农业生产，提高了粮食产量。二是修建水库、堤坝、水渠等水利工程以应对自然灾害对粮食安全的威胁。据《管子·度地》记载，齐国统治者为应对水灾、旱灾、风雾雹霜、虫灾等自然灾害设置专门官员维护和修补堤坝和水库，在分洪蓄水、灌溉农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大提高了农作物产量。

以粮食为武器不战而屈人之兵

“不生粟之国亡”，《管子》一书的粮食安全思想不仅凸显了粮食安全之

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而且把这一思想付诸于外交领域，将粮食作为一种战略资源和手段，通过粮食外交消灭了一些国家从而成就了齐国霸业，实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

作为春秋时期出现的第一个霸主，齐桓公曾在粮食外交中多次运用粮食战争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管子·轻重戊》记载的买绌囤粮降服鲁、梁就是其中的一个经典案例。鲁、梁两国是齐国的两个邻国，也是齐桓公称霸大业中必须灭掉的两个强劲对手。管仲就如何灭掉鲁、梁向齐桓公献计，提出要使鲁、梁两国放弃农业生产而依靠向齐国大量供应绌来发财致富。齐桓公接受管仲的建议，通过政令使鲁、梁的特产绌在齐国价格飞涨，诱使鲁、梁两国的国君下令要求全国百姓生产绌而放弃农业生产。十三个月后，齐国又通过政令的形式禁止齐人穿绌而改穿帛，并封闭关卡，断绝与鲁、梁的经济往来。此时，鲁、梁两国早已因全民织绌而荒废了农业生产，粮食难以自给，结果是两国相继发生严重饥荒，不得不购买高价粮以维持生存，最终导致鲁、梁两国的国家财政陷于瘫痪，鲁、梁君主只得乖乖地屈服于齐国。

除了买绌囤粮降服鲁、梁这一经典案例，《管子》一书还记载了不少齐桓公以粮食为武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案例，例如买柴囤粮降服莒、莱，买鹿囤粮降服楚国，买狐囤粮降服代国，以及买兵器囤粮降服衡山国等。鲁国等国之所以被齐桓公用粮食武器所征服，根本原因就是这些诸侯国的国君见利而忘忧，放弃粮食生产。他们用国破家亡的惨痛事实印证了“不生粟之国亡”。

历史文化典籍



□ 王志强

受民爱戴的东氏父子

在古代政德文化中，文武双全是对为官能力最高的褒扬，也是最为百姓喜闻乐道的故事题材。明代中期，陕西华州的东思忠、东汉父子二人都是允文允武，在思想上以民为本，在职位上恪尽职守，将地方打理得井井有条，践行了修齐治平的从政理想。

“西北长城”东思忠

据隆庆《华州志》载，东思忠精于《尚书》，在高中进士后，便被派遣至刑部河南司任职。受理案件时，东思忠从不避讳和阿谀权贵，即使嫌疑人有很大的权势和名声，他也坚持受理案件，对权贵和百姓一视同仁，用不偏不倚之心判决案件。东思忠的行为赢得了百姓的尊重和认可，也得到了刑部的重用，不久便被调到情况复杂的云南司任员外郎。

在云南司期间，东思忠主要负责平反既往的冤案错案。东思忠有着一套自己的审案理论，他主张用细致严密的证据链来断案，而不是用残酷的刑罚来逼迫嫌疑人。他认为在严刑峻法之下，得到的不会是事实的真相，只会是嫌疑人为逃避酷刑而被迫认罪。他对下属说：每个案件都有它的细微曲折之处，这是用鞭打等刑罚审不出来的。

对于难以断定的案子，东思忠采用《尚书》中的“罪疑惟轻”精神，用良善之心对百姓推心置腹。在东思忠的努力下，云南一地冤案大为减少，恶势力嚣张气焰得到了压制，朝廷公信力和百姓凝聚力也得到了增强。东思忠的宽仁之心被当时的云南上下所看重，云南官员两次推荐他担任府丞。

成化十八年，东思忠升任四川按察司副使。甫一上任，东思忠便整饬松潘一带的兵备，操练士兵，聚集粮草，探寻当地的军民利病，随时准备迎接战斗。两年后，边境外族入侵，其队伍声势浩大，蜀地一日三惊。东思忠亲率大军前往征讨，因前期准备

充分，征讨军屡破外敌，声威大振，敌军或逃或降，就此东思忠稳住了四川的民心，安定了蜀地的秩序。土民亲切地称赞东思忠为“西北长城”，将其视为边境的保护神。在民生工作上，东思忠也展现了以民为本、关爱百姓的一面。当时的松潘、孤夷、万山一带因运输困难，致使米价昂贵，再加上相关官吏上下其手，百姓生活极其困苦。了解这一情况后，东思忠双管齐下，一方面严惩贪腐，减少吏员伸手的机会；另一方面则率领士民在大石佛嘴一带凿山开路，以便于粮食的运输。在东思忠的苦心经营下，当地仓储的粮食充裕，士民不再有饥寒之忧，百姓有了衣食富足之乐。因积劳成疾，东思忠病逝于任上，年仅四十五岁，蜀中百姓极为哀恸，追思不已。

“刻碑立像”的东汉

东思忠之子东汉，和他的父亲一样允文允武、爱民如子。在隆庆《华州志》的记载中，东汉先任池州府同知，在任期间，督造黄册，剿灭盗贼，招收流民，政绩斐然。池州有大盗召集亡命之徒占山为王，肆无忌惮地劫掠商旅和百姓，群众苦不堪言。东汉到任后，主动选拔精壮前往平乱。他先在险隘之处摆好阵势，与匪徒相峙于野外。而后令人趁机从后面夹击匪徒，在匪徒慌乱之中擒拿住了匪首。接着东汉利用剩余匪众的营救心理，在关键之处埋伏，成功将所有匪徒一网打尽。因以一介书生多次主持剿匪、平乱等军事事宜，东汉被时人誉为“书生而能负卫霍之略”。

东汉为官以清正廉洁著称，池州粮长柯瑞将黄金藏在葡萄盒中，以送葡萄的名义将黄金送给东汉，东汉发觉后，立刻将此事公布出来，郑重声明自己对于行贿受贿的深恶痛绝态度。此举震惊了池州的官吏，有效打击了池州官场的不良风气。不久东汉改任镇江府同知，虽然换了一地担任

同知，但东汉的本心不变，仍然坚持以民为本、造福一方的理想。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东汉，在镇江一带为东汉刻碑立像。

因在地方任职期间的兢兢业业，东汉被调任至户部为官。其间东汉严厉抵制当时官场上流行的“羡金”（下级给新到的上级送礼）劣习，他常常将下级送来的“羡金”原封不动地退回。并且，东汉还查出了江西一带的粮政弊端，仅此一项，就为国家挽回了五百万石的粮食损失。在王阳明平定宁王宸濠之乱时，东汉多方奔走，殚精竭虑地筹备粮食，为王阳明平叛提供了有效的后勤支撑。

再升任为九江知府，身为九江府的主官，东汉修缮文庙，打击水贼，捣毁淫祠，为九江干了非常多的实事。在任期间恰逢九江一带发生灾荒，东汉主动开仓赈灾，并且对于其他郡县前来进食的百姓一视同仁，不因他们不是自己治下的百姓就拒绝给粮。他对底下官员说道：我们救济百姓时，为什么要区分他们是不是自己辖内的呢？在其积极的救济下，大量的百姓得到了一条活路。九江因是守御重地，朝廷设立镇守太监，负责监督九江一带的官员。当时的镇守太监器张跋扈，东汉不改耿介本色，敢于跟镇守太监据理力争，对于不合理的做法绝不妥协，其行为为令江南一带的官员为之侧目。

嘉靖七年，东汉迁任长芦盐运司运使。盐运司在明代乃是赏功酬劳的美差，历任盐运司运使在利益的纠葛下往往没有多少作为，而东汉抱着秉公之心，厘清了很多盐政的弊端，打击了胥吏的盘剥，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方志里的故事



典故中的历史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典出北宋欧阳修所著的《新五代史伶官传序》。在这篇史论中，欧阳修通过对五代时期后唐盛衰过程的精辟分析，掷地有声地提出国家的兴衰存亡不取决于天命而取决于“人事”的论断，借此告诫北宋统治者要深刻汲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始终励精图治，重贤者远小人，从而保持国家的繁荣昌盛。

公元908年，唐末著名军阀晋王李克用在临终之际唤来自己的儿子李存勖。他颤颤巍巍拿出三支箭，对儿子说道：梁贼未温与我晋国有不共戴天之仇。燕王刘仁恭是我所立，契丹耶律阿保机与我约为兄弟，但都背叛了我。我未能灭此三贼，死有余辜。我给你三支箭，你将来一定要消灭这三个敌人，以告慰我在天之灵。

李存勖谨记其父之言，将这三支箭供奉在家庙中，每逢出征前都要祭祀，将箭矢请出，放入锦囊，随身携带，战胜后送回家庙再次供奉起来。他平柴燕、败契丹、灭后梁，每战皆是如此，终成一番霸业，用15年时间建立后唐，完成了父亲的遗愿。然而在巨大的胜利面前，李存勖迷失了。后期的他沉溺于声乐，重用伶人、宦官，疏远有功之士，对老百姓横征暴敛，落得个军民离心、天怒人怨的下场，终死于兴教门之变。在他死后仅10年，后唐也分崩离析，走向灭亡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李存勖和后唐的命运，令人扼腕。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是对李存勖一生品行的刻画，但又不是仅仅对他一人。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同样是一个典型，两人都是谨记父命、励精图治而兴，又都是沉迷享乐、麻痹大意而亡。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率军伐越，在携李之战中被越王勾践击溃，于败退途中不治而亡。阖闾临终前叫来儿子夫差，告诉他：你会忘记是勾践杀了你的父亲吗？夫差答：没有，不敢忘记。

继位后的夫差发愤图强，厉兵秣马、枕戈待旦，等着复仇机会的来临。机会很快就来了。公元前494年，勾践听说夫差想报仇，准备先发制人，抢先伐吴。没想到风水轮流转，在夫椒之战中全军覆没，还被夫差一鼓作气端了大本营会稽。原本想

欺负夫差的勾践，转眼间就几近于亡国之君，只能屈服投降。

然而此时的夫差被巨大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似乎把杀父之仇忘了，竟听信伯嚭的谗言，接受了勾践的投降。在被勾践贴心服侍一段时间之后，更是精神懈怠，不再警惕，放虎归山，后期甚至把伍子胥这位“国之柱石”给杀了，自毁长城。以至于有了之后“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典故流传于世，自己也落得个身死国灭的悲惨下场。

夫差和李存勖的一生是对“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最好注解。纵览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这样的例子又何以百计、千计？夫差和李存勖只是比较典型的两个例子罢了，其中的教训才是值得深思的。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然而，虽然欧阳修著此雄文，是为了让北宋统治者不再重蹈覆辙，但历史规律就是如此颠扑不破，同样的历史教训却又在北宋统治者身上再次发生了。

宋徽宗继位后，耽于享乐，重用小人，导致朝政荒废、民怨沸腾，最终落得个悲惨的“靖康之耻”的结局，北宋就此灭亡。对此，元朝编撰的《宋史》对宋徽宗统治时期“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的点评可谓与欧阳修的“逸豫可以亡身”的论断遥相呼应，颇为讽刺。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体现的是一种宝贵的忧患意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可贵品质，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却仍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其实又何止欧阳修作过“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论断呢？且不说出自《孟子·告子下》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即使同样是在北宋，苏洵的《六国论》中就写道：“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王安石在《金陵怀古》中写道：“霸祖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双。”可惜，同样的历史教训在欧阳修、苏洵、王安石之前屡屡发生，在他们之后仍旧屡屡发生，不得不让人喟然长叹。

以古映今，只有时刻心怀忧患意识，方能做到防微杜渐、有备无患，成竹在胸、行稳致远。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 朱国峰